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新刚：希望重新定位希罗多德这个作家

本报记者 李纯一

希罗多德才是第一个全球史作家

文汇报：霍布斯称修昔底德为“有史以来最具政治感的历史作家”，那在您看来，希罗多德最真的是哪种“感”呢？

张新刚：一般认为霍布斯曾经有过一段“人文主义时期”，而这一个时期结束的标志事件就是翻译了第一个完整的英文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霍布斯的这一讲法实际上说出了修昔底德写作的一些重要特点，借用莫米利亚诺的说法，修昔底德写的是当代史，并且写的是政治史。与修昔底德相对，希罗多德写的是过去的历史，并且还有大量民族志一类的内容。修昔底德以后，古代作家都有一个漫长的批评希罗多德的传统，最著名的就是西塞罗的说法，即希罗多德既是历史学之父，也是谎言之父。

所以，要说希罗多德最带什么感是挺难的。从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我也是在阅读修昔底德时很容易就能找到感觉，但是读希罗多德就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些门道，如果非要回答的话，那么现在在可能会说希罗多德极具“真实感”。这个真实感并不是说他写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当然，他记述的相当多的内容都已得到考古等发现的印证），而是说他对他人事和希波战争的探究方式和结论有很强的真实感。

文汇报：理查德·詹金斯说希罗多德具有“广泛的同情”，对于希腊的敌人也同情；不同于后来的希腊人把非希腊人一概视为“蛮族”。希罗多德还喜欢旅行，到过意大利半岛南部、黑海沿岸、波斯、叙利亚和埃及等地，也被称为“旅行家之父”。您觉得旅行对他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张新刚：晚近学界全球史的研究范式很热闹，我开玩笑说，希罗多德才是第一个全球史作家。希罗多德在当时其实完成了两个不可能的任务，一是写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的历史，二是游历地中海，收集大量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我们今天无法还原他的游历和收集资料的细节，但是从《历史》文本来看，还是可以看出来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比如对所谓蛮族（barbarian）的认知，在他笔下，其实叫作异族更合适一些。

仔细读整本《历史》的话，会发现整本书的主线其实是波斯的兴衰，第一卷就是在讲大王的统治权如何从吕底亚转到居鲁士领导的波斯，第二卷埃及卷也是因为冈比西斯要征服埃及而进入整体的叙事，第三卷是波斯宫廷政变以及大流士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帝国体系，第四卷是大流士对斯基

听过张新刚的西方古代史经典研读课程的学生都表示，他讲课非常“抓人”。我们从他的课程讲义《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中可见一斑。全书从“甜咸粽党”之争开始，让读者思考不同习俗和价值的相遇。而这也是“历史学之父”、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意图探究的问题——希腊人和异族人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希罗多德认同品达的名言“礼法是万物之王”，而习俗/礼法的背后是何谓幸福，何谓自由。张新刚写道：“难道他是认为希波战争根本上是出于文明的对抗和冲突吗？”

张新刚2012年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法学博士，之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历史学系，2020年起任教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日，本报采访了张新刚教授，听他聊聊这部讲解希罗多德《历史》的小书。

► 搏斗中的波斯战士(左)与希腊重甲步兵
基里克斯陶杯,公元前5世纪

泰的远征，从第五卷开始才慢慢进入希波战争的核心内容。到全书的最后，希罗多德也是以波斯大王的几个富有深意的故事收尾。所以，这本书中更多的是以他写作对象的方式来书写，真正的东西方冲突（自由&奴役）是在希腊对抗薛西斯时才最为明显。这个可能是旅行给他带来的影响，让他能够鲜活而真实地看待世界的多样性，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前几天和徐晓旭老师聊希罗多德写的斯基泰人，他有个说法比较好，即希罗多德是个人类学家。

要理解希罗多德，就要看他如何通过探究爱智慧

文汇报：您觉得这份讲义，最特别的是在哪个部分？您从品达的“礼法是万物之王”开始，构建整本书的框架。不同礼法、习俗之间的冲突这个解释体系，是不是一直以来人们对希罗多德《历史》的主流读法？

张新刚：回答这个问题有种老张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我是希望给出对希罗多德的总体性解释，这听起来就很怪，一部历史还会有什么需要解释的空间？这本小书是希望重新定位希罗多德这个作家，如果把他放回希腊的智识传统中，他上承史诗传统，自己也进行过口头表演，和希腊的悲剧作家关系也不错，再后来有了修昔底德的作品以及前四世纪集大成的哲学。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他写作“探究”（也即“历史”）的动机和努力呢？

一个重要的线索是看他的批评者是如何批判他的，亚里士多德批判他的语气是说写历史很难获得智慧，再早一些，赫拉克利特也批评过“探究”，说这东西看似博学实则拙劣。这些批评是否成立暂且不说，但是却说明了当时的哲学家认为希罗多德是在做爱智慧的努力，只不过很失败而

已。那么，如果要理解希罗多德，就不能简单地按照今天对历史学家的理解去解释他，而是要看他如何通过探究爱智慧。这本通识课讲义基本是围绕这个出发点进行解读的，当然很多内容也只是一家之言，发表出来供方家指正。

“习俗/礼法”的确是解释希罗多德的重要线索之一。这个主题当然不是我发现的，以前的学者们早已注意到习俗这个主题的重要性，但大多都把习俗的讨论集中在对第三卷一些文本的解释上。我是想将习俗主题作为理解《历史》的总体系线索，自己觉得比较有贡献的解读是对巨吉斯偷窥事件和冈比西斯疯狂的解释，目前觉得是能自圆其说的。学界对希罗多德的研究是无比丰富的，仅说21世纪以来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在希罗多德的叙事学、史料批评、接受史、民族志和比较研究等方面，特别是叙事学的进阶也出现一些很具启发的专著。

拥有了经典作品的加持后，最终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路

文汇报：您在序言中引述了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里的一段话：“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您强调阅读经典是一个绝对个人化的体验，不是社会功能意义上的教育，而更接近生命教育。能否谈谈您自己在阅读与教授经典期间的生长变化？

张新刚：在布鲁姆去世那天，我刚好上了希罗多德这门课，就在课堂上念了这段话以纪念老爷子。我基本的学术训练是思想史，一直被经典作品折磨，但是也获益匪浅。无论中西文明，能够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肯定是对人和世界的根本问题有深入思考的精华，甚至塑造了后世思考这些问题



的基本范式。所以我很赞同在学习阶段多读经典著作，因为这些经典作家对问题的思考是深入而系统的，能够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也能帮助自己更加清醒地观看与生活。我总是劝说学生，经典作品是值得信赖的，大可放心地跟经典作家们进行思想冒险，而在拥有了这些加持后，最终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路，毕竟就像布鲁姆说的，自己最终还是孤独地以自己的死亡相遇。

文汇报：《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之后还会有“修昔底德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整体构想吗？还会“索福克勒斯篇”吗？我们注意到您在另一本新著《友爱共同体：古希腊悲剧思想研究》中引用了大量古希腊悲剧文本。

张新刚：在《友爱共同体》一书中，除了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外，我的确花了大量篇幅讨论悲剧和历史文本。这不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试图探索一种新的政治思想研究方法。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大多集中在哲学家群体上面，这无疑很重要，我也受惠于此。但是我这几年越来越发现，除了哲学家群体外，政治思想史还需要面对特定共同体的政治主体的政治思考。雅典的悲剧恰恰是面向城邦公民群体上演的，讨论的都是城邦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历史文本中记述的很多内容是公民群体的集体决策和政治行动，所以悲剧和历史文本是政治主体的思考，从这些文本中，也能得到另一种真实的政治思想。

《古希腊思想通识课》系列目前只和出版社签了两本，《希罗多德篇》印出来后陆续收到各个界别读者不切实际的肯定，也给了我一些能够胜任此类书写的错觉，因为我一直觉得出讲稿和文集是资深学者才有资格做的事情。最近看到国内引进很多日本学者写的中西经典导读书，国内学者出于种种原因很少写这类书，如果出书社愿意继续赔钱，我就继续扩充这个系列吧。

稣会成为一名辅理修士。

方百胜能够来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修理钟表的修士所起到的作用”。因此，比利时耶稣会将精通钟表修理的方百胜转给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不过，1847年到达上海的方百胜只是待在徐家汇的住院里为神父们修理挂表，他的主要精力则是作为教区账房经营位于董家渡的事业。

方百胜之所以转换了自己的角色，又缘于有新来的精通钟表修理的辅理修士。一位是1856年到达上海的德国耶稣会士杨恒离（Heinrich Hamakers, 1830—1862），另一位是1859年到达上海的法国耶稣会士俞寿祺（Casimir Hersant, 1830—1895）。据称方百胜在他们来到上海后，就把自己的锉刀、放大镜、螺丝刀、发条和所有工具都交给了后者。

杨恒离在华活动不久，即于1862年去世。由于晚清时局不定，方百胜、杨恒离、俞寿祺等辅理修士承担了很多教育、医疗、慈善方面的具体工作，修理钟表只是局限于教会内部的零星服务。

* * *

《益闻录》在1879年创刊第二期开始，连续多期刊印《明大西利玛窦先生行述》。而新教传教士在编辑《格致汇编》时，不仅为利玛窦等作传，且刊印了徐光启与利玛窦的谈话图，以突显二人的科学贡献。

而徐光启第十二世孙徐宗泽（1886—1947）则重复了利玛窦作为钟表业“祖师爷”的讲述：“因此我们中国的钟表业，竟将他的像，高悬店中，奉为钟表的祖师。”徐宗泽在另一篇短文《利玛窦的贡品》中，特别提及“报时钟二架”，钟上罗马字都该用中文，他还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小问题：“故宫内尚存许多的各样的钟表，不知利玛窦所贡献的，现尚留存吗？”

四百余年前的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他在华的历史活动成为近代来华西人接触和融入中国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他的行迹对后来者而言具有典范意义。而利玛窦被奉为近代钟表业的“保护神”，则是其扮演的跨文化角色的在地化和“异化”，可视为全球跨文化交流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利玛窦与自鸣钟

李强

结了明末至十九世纪初有关钟表的种类、构造、性能、修造技术和使用保养方法，并附有五十余幅机械零件图。《自鸣钟图法》是《高厚蒙求》合辑中的一辑。《高厚蒙求》相继刊刻于嘉庆十二年至二十年（1807—1815），是徐朝俊科技知识著作的集合，分五个重心：谈天、论地、中星表、日晷仪、自鸣钟。

不过王尔敏先生在《近代科技先驱徐朝俊之〈高厚蒙求〉》中认为，利玛窦入北京时尚不可能带来自鸣钟。而在徐朝俊的时代他无疑是自鸣钟制造原理方面的专家，徐朝俊此书的刊刻反映和促进了自鸣钟在江南民间社会的制造与应用。

到了晚清时期，一些咏咏自鸣钟的诗歌也出现在新兴的报刊中。如1877年12月28日的《申报》刊登了署名“鹭湖打仙花仙史雪生”的与自鸣钟相关的韵诗，1878年3月19日《申报》又刊登了署名“晓香书屋卢江氏”的两首咏自鸣钟诗。上海的本土钟表店也越来越多，《申报》中甚至有不少关于自鸣钟失窃的报道。

在上海新北门外天主堂街出版的《格致新报》，以及《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晚清西学报刊上，也曾刊登过有关钟表的文字。此外，钟表的流行也促成实业方面对土产钟表的注意。清末北洋设立的直隶工务局即于1905年左右设立钟表厂，主要是出于商业考虑。如报道所言：“工艺局以近年东西洋输入之钟表日多一日，此后文器渐用，人思佩带，每年销数日增，诚为器用品中绝大漏厄。”（《广益丛报》1905年第79期）有趣的是，利玛窦居然也随着自鸣钟在中国的流通，成为近代上海钟表行业的“保护神”。

成为“行业神”的利玛窦

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在徐家汇出版的中文报刊《益闻录》，曾刊登过题为《钟表表目》（1883年第223期）的文章。作者根据西书记载，介绍了自鸣钟最早出现的时间，以及利玛窦与自鸣钟入华之

张岱（1597—1679）为晚明散文大家。他的《湖心亭看雪》是最为人所称道的作品之一。杭州西湖，人间天堂，“钱塘自古繁华”（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暖风熏得游人醉”（林升《题临安邸》），容易使人安逸享乐。而张岱别具一格，写出一个苍凉凄寒孤寂的审美意象，在历代写杭州西湖的诗文里，可谓空前绝后。全文不到两百字，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要点：

其一，时间。崇祯五年，大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张岱写作此文的时间不详，从开头一句似乎是在回忆之中的语气来推断，大概在“崇祯五年十二月”之后，他已经不在西湖了（就在这个月，张岱父亲去世，他回绍兴守孝）。而在此前后的几年里，在北方，内有义军，外有寇敌，战事频仍。对此，张岱可能没有知觉。这是文章的时间背景，隐含忧戚。

其二，空间。有论者指出，这篇文章有一个视角的转换。“雾凇沆沆，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几句夹在上下文的叙述之中，显得很特别，仿佛忽然飞到高空，仰望俯瞰“上下一白”的天地山水。这个视角，类似宋代以来中国山水画的全景视角和散点透视，巨细无遗，有大气象。这是整个审美意象的空间背景，奠定基调。

其三，人物。湖心亭上，比张岱早到的那两个人，“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金陵是明朝最初建都之地。这两个金陵人客居杭州，正好与张岱在这样一个情境中偶遇。而文章在一口气叙述到“强饮三大白而别”之后，特别补录一笔，并且，借舟子之口，引导读者注意这两个金陵人，占到全文五分之一篇幅，是不是别有一番含义呢？

要言之，这篇文章的文眼在一个“痴”字，但是，这个“痴”的意味，乃至整个文章的意见，还是有点复杂的，绝不只是一个文人雅士在日常生活中不同于寻常人等的痴狂。

至于舟子眼中的张岱的“痴”，在他的一生之中，尤其是前半生的常态化表现，就是他那些出了名的五花八门的癖好。在69岁的时候写的《自为墓志铭》里，他把这些癖好一一罗列出来：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古董，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囊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如此繁华热闹，好似烈火烹油，极尽尘世间的快活，与“湖心亭看雪”之超凡脱俗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两者其实又是相通的，因为他的“痴”和“癖”本来就是一回事。

张岱可能不曾料想，这个“纨绔子弟”的形象几乎成了他留在后世很多人心目中的标准像。他们津津乐道的，只是他的这些癖好，全然不顾他自己对此所作的总结：劳碌半生，皆成梦幻。紧接着，就在这样一个开头之后，张岱笔锋一转，道出了之所以“皆成梦幻”的原因：

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纸，缺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前五十年前的繁华和二十年的惨淡，更是一个强烈的反差。由此，张岱想说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徒然留恋前五十年前的繁华。盖因后二十年的惨淡，是他自己选择“身不事二姓”（《贫士七首》之六）的结果。

他的“癖”是他的“痴”发出来的表征，而他的“痴”乃是得天独厚的情性和才华之凝聚。在常人看来，但凡有所癖好，就是沉溺于各种物事，所谓玩物丧志、逐物癖好；按照这样的理解，张岱的这么多癖好，早已把他整个人搞得破破烂烂，不可收拾了。但是，在张岱这里，那些癖好简直就是他各种养学、才能、技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不仅需要有外在的物质条件，更需要有内在的精神资质，这内外两个方面，都需要有几代人的丰厚积累，而张岱恰好都具备了。

正因为如此，外在物质条件的变化就算会让他感到失落，也不足以造成他在内在精神资质的损伤。也因此，他才可以忍受“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的穷困贫苦。他内心的沉痛，他的“皆成梦幻”“真如隔世”的感慨，更在于“国破家亡”这个重大的变故本身，而不是由此带来的个人生活的变化。

他知道，这是常人不容易理解的。所以，他列举自己有“七不可解”，所谓贱寒、贫富、文武、尊卑、乐、书、膝、卷四为记、碑、辨、制、乐府、书牍，卷五为文、卷六为祭文、琴操、杂著、颂、词。这部文集的体裁和题材，跟他的癖好一样，五花八门的。而这种写作趣味也同样呈现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等文集之中，后人谓之“性灵派”的风格，实则包含着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抱负。这种抱负也是张岱的家传。张岱的祖父张汝霖曾经“以三十年之精神”，致力于编纂一部大辞典，尽收天下知识，按音韵排列，总名之《韵山》。后来，有人带来一部成书于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的《永乐大典》三十多本，张汝霖顿时感到个人力量的薄弱，叹息“书囊无尽，精卫衔石填海，所得几何”，于是辍笔。张岱为之感到非常可惜。张岱的几种小品文集虽然不是辞典或百科全书的形式，但是它们无所不包的内容与百科全书的精神实在也有相通之处。

在此值得一提的《琅嬛文集》这个书名。“琅嬛”指的是张岱于顺治六年租住的“快园”。这原本是张岱祖辈的产业。他小时候经常随祖父在此游玩。等到张岱赁居之时，这个“琅嬛福地”已经破败不堪。张岱为此给朋友写信，开玩笑说：“孔子何陋，乃居陋里；况叔臭，而住香桥；弟极苦，而住快园。”同样的，《琅嬛文集》这个书名，也带有一种戏谑的成分——即便是如此这般的沉痛，也改变不了张岱的“性灵”，改变不了他的痴和癖，他的深情和真气。

朱生坚

从「湖心亭看雪」谈起 张岱的癖好与抱负



意思，似乎把他的癖好当作他仅有的可以安身立命、流传后世的東西。这当然是一种说辞而已，但也确实包含着他一以贯之的观念。他有两句广为人们熟知的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陶庵梦忆》卷四）在他看来，癖好是深情，是真气。也就是说，他真正可以流传后世的是他自己内在的深情和真气，而不是他表面上在追逐的那些外在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知道，张岱一生之中并非一无所成，恰恰相反，他从少年以至终老，有大量著述，而且多半是在明亡之后。《自为墓志铭》里说：

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爨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史纲》《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侯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

这个书目的排列很有意思。《明易》以下，大致对应应书子集四部。通常的做法是把经学放在所有个人著作之首，而张岱却把四种著作放在《明易》之前，这样的排列，凸显了这四种著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说明了他真正的抱负所在。

这四种著作，分为两类，前三种为一类，以《石匮书》为代表，是历史著作。后一种《琅嬛文集》为一类，是通常所谓小品文。

《石匮书》是自洪武至天启年间的明代纪传体通史，凡二百五十万字。张岱写了二十七年，“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石匮书自序》），对明代重大历史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反思明代亡国的历史教训。后来，张岱应聘到杭州帮助应谷泰修撰《明史纪事本末》，利用谷氏收集的史料，作《石匮书后集》六十三卷，现存五十六卷，五十万字。“张岱一门向有‘史学世家’之称，自其高祖张天复起，积书累万，一直致力于史学资料的搜集；于地方志史，尤多建树。张岱继承先人遗志，试图从总体上对‘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的明代历史做一次全面整理和总结。”（胡益民《张岱评传》）要言之，张岱写《石匮书》，担当着于国、于家、于己的责任。《陶庵梦忆》自序言：“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人世。”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司马迁受刑之后的感受，而张岱也确实有意追慕司马迁。

《琅嬛文集》收录张岱历年各种体裁的文章。卷一为序，卷二为记、启、疏，卷三为檄、碑、辨、制、乐府、书牍，卷四为诗，卷五为墓志铭、跋、铭、赞，卷六为祭文、琴操、杂著、颂、词。这部文集的体裁和题材，跟他的癖好一样，五花八门的。而这种写作趣味也同样呈现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等文集之中，后人谓之“性灵派”的风格，实则包含着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抱负。这种抱负也是张岱的家传。张岱的祖父张汝霖曾经“以三十年之精神”，致力于编纂一部大辞典，尽收天下知识，按音韵排列，总名之《韵山》。后来，有人带来一部成书于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的《永乐大典》三十多本，张汝霖顿时感到个人力量的薄弱，叹息“书囊无尽，精卫衔石填海，所得几何”，于是辍笔。张岱为之感到非常可惜。张岱的几种小品文集虽然不是辞典或百科全书的形式，但是它们无所不包的内容与百科全书的精神实在也有相通之处。

在此值得一提的《琅嬛文集》这个书名。“琅嬛”指的是张岱于顺治六年租住的“快园”。这原本是张岱祖辈的产业。他小时候经常随祖父在此游玩。等到张岱赁居之时，这个“琅嬛福地”已经破败不堪。张岱为此给朋友写信，开玩笑说：“孔子何陋，乃居陋里；况叔臭，而住香桥；弟极苦，而住快园。”同样的，《琅嬛文集》这个书名，也带有一种戏谑的成分——即便是如此这般的沉痛，也改变不了张岱的“性灵”，改变不了他的痴和癖，他的深情和真气。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